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写经书法研究与分析

任莉, 李加辉, 邵伊蕾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300380

DOI:10.61369/HASS.2025080001

摘 要 :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作为吐鲁番盆地佛教文化的核心遗存, 其出土的写经书法是古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珍贵物证。本文以千佛洞6—13世纪汉文、回鹘文写经残片为研究对象, 通过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与遗存特征, 从笔画、结体、章法、墨法四个维度系统解析写经书法的艺术形态, 深入探究地域文化交融、宗教功能诉求、物质技术条件对其风格形成的综合影响, 并通过与敦煌写经、中原楷书的对比, 明确其在西域书法史上的独特定位。完善对于柏孜克里克写经书法专项分析的学术内容, 为西域书法艺术研究提供微观实证, 也为丝路文化的具象化研究提供新视角。

关 键 词 :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写经书法; 艺术形态; 文化成因; 丝路书法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Calligraphy in the Sutra Transcriptions from the Bezeklik Thousand-Buddha Caves

Ren Li, Li Jiahui, Shao Yilei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0

Abstract : As a core relic of Buddhist culture in the Turpan Basin, the calligraphy in the sutra transcriptions unearthed from the Bezeklik Thousand-Buddha Caves serves as precious material evidence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ragments of Chinese and Uighur sutra transcriptions from the 6th to 13th centuries in the Thousand-Buddha Caves. By tracing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xamining their relic characteristics,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artistic forms of the calligraphy in the sutra transcriptions from four dimensions: strokes, structure, composition, and ink techniques. It delves into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s of regional cultural integration, religious functional demands, and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its style. Furthermore,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Dunhuang sutra transcriptions and the regular script of the Central Plains, it clarifies its unique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alligraphy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academic content of specialized analysis on the calligraphy in the Bezeklik sutra transcriptions, provides micro-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f calligraphy art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oncrete study of Silk Road culture.

Keywords : Bezeklik Thousand-Buddha Caves; calligraphy in sutra transcriptions; artistic form; cultural causes; Silk Road calligraphy

一、千佛洞的历史沿革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胜金乡木日吐克村南约3公里的火焰山木头沟中, 由于没有确定的文献资料参考, 从壁画风格看, 大约始建于南北朝末期(公元5—6世纪), 在唐宋时期盛行, 于元末明初开始进入尾声。是高昌地区佛教活动与文化传播的核心。洞窟遗存约数百件写经残片, 涵盖汉文、回鹘文、梵文等多种语种, 不仅是佛教经典传播的物质载体, 更凝结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书写者的艺术智慧。其书法风格既承载着中原书法的传统基因, 又浸润着西域的地域审美特质, 形成了“规范中见灵动, 刚健里含温润”的独特面貌。

从学术价值来看,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千佛洞的考古断代、壁

画艺术及写经的文献校勘, 对书法艺术的专项研究相对薄弱——仅在西域书法史著作中一笔带过, 或侧重单一语种的文字学分析, 缺乏对其书法形态的系统拆解与成因探究。从文化价值来看, 柏孜克里克写经书法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双向互动”的见证, 其风格演变直观反映了丝路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因此, 开展本次研究, 既是对西域书法艺术微观研究的补充完善, 也是对丝路文化交流形态的具象化解读。

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写经的历史脉络与遗存概况

(一) 高昌佛教兴衰与写经体系演变

柏孜克里克写经书法的风格演变与高昌地区佛教发展及政权

更迭深度绑定，可分为三个核心阶段：

1. 初创期（6-7 世纪，高昌国时期）：麹氏高昌政权推行“崇佛兴教”政策，建立由王室资助、寺院主导的写经体系，写经主体为寺院高僧与专职写经生。此时中原魏晋楷书的规范化成果经丝路传入，写经字体多承袭北魏“方折刚健”的书风，同时融入西域“简率实用”的书写需求，形成“规范初成”的风格基调。

2. 鼎盛期（8-10 世纪，高昌回鹘早期）：回鹘人定都高昌后，延续佛教信仰并吸纳中原文化，写经活动达到鼎盛。此时唐代楷书“尚法”精神传入，欧阳询、褚遂良的书风影响显著，写经字体在保持方折特征的同时，增添“温润规整”的特质，形成“刚柔并济”的成熟风格，且出现汉、回鹘文双语写经的现象。

3. 转型期（11-13 世纪，高昌回鹘晚期）：随着伊斯兰教东传，佛教渐趋衰落，写经活动减少且规范性下降。写经主体以民间信徒为主，字体出现“行书化简化”特征，方折减弱、连笔增多，但核心结体仍延续前期传统，呈现出“率意中守规范”的过渡风格。

（二）遗存概况：材质、语种与字体特征

据现有考古资料，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写经遗存以残片为主，散藏于中、德、英等国博物馆，其核心特征如下：

1. 材质：多以桑皮纸、麻纸为主，厚度 0.01-0.04cm，部分经施胶、研光处理；墨料多为松烟墨，少量残片有朱笔校勘或标点。（新疆博物馆藏《妙法莲华经》残片（桑皮纸，朱笔界格））

2. 语种：汉文占比约 65%，回鹘文占 28%，梵文、吐火罗文占 7%；汉文经卷以大乘佛教经典为主，回鹘文经卷多为汉文经典译本。（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回鹘文《金光明经》残片）

3. 字体：以楷书为主体（占 80%），少量为行书（占 15%），极个别为隶书变体（占 5%）；不同时期书体占比随佛教兴衰呈现波动。（新疆博物馆藏《金刚经》残片（楷书）、《般若波罗蜜经》残片（行书））

（三）写经的属性特征：宗教性与实用性的统一

柏孜克里克写经的双重属性直接决定了其书法风格的基本取向：

1. 宗教性主导“规范庄严”：写经被视为“积累功德”的核心方式之一，《续高僧传》载高昌僧人“缮写经文，必端严楷正，以示虔诚”，因此笔法规整、结体端庄成为基本要求，杜绝潦草随意的书写态度。

2. 实用性决定“简率易识”：写经的核心功能是传播佛教教义，需满足不同文化水平受众的辨识需求，因此放弃了书法艺术中的个性化表达与复杂笔法，选择楷书为主体，并对笔画进行适度简化，形成“易写易认”的实用特征。

这种“宗教性与实用性的平衡”，构成了柏孜克里克写经书法独树一帜的核心特质。

三、柏孜克里克写经书法风格的成因探究

柏孜克里克写经书法的独特形态，是文化交融、标准需求、物质条件三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三者共同构成了其风格生成

的完整逻辑链。

（一）文化交融：中原书法传统与西域审美的双向塑造

高昌地区“丝路枢纽”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其书法风格的“交融性”特质：

1. 中原书法的“基因输入”：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中原书法的鼎盛期，楷书规范化成果通过三条路径传入高昌：一是僧侣往来（如法显、玄奘途经高昌时带去经卷与书写范式）；二是丝路商贸（中原纸张、毛笔与书法作品随商队传入）；三是王室交流（高昌国王麹文泰与唐朝的文化互通，引入欧阳询、褚遂良的书风）。这些文化输入为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写经书法汉地风格的形成奠定了“规范端庄”的中原基因。

2. 西域审美的“本土化改造”：西域民族“尚刚健、重实用”的审美倾向，对中原书法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将唐代楷书的“圆转温润”转化为“方折刚硬”，使其更加适应西域民族的审美；将文人书法的“繁复笔法”简化为“简率笔画”，适应了宗教传播的实用需求；将中原楷书从“纵势修长”调整为“横势扁方”，契合西域的视觉偏好。这种从输入到改造再到融合的过程，造就了其独特的书写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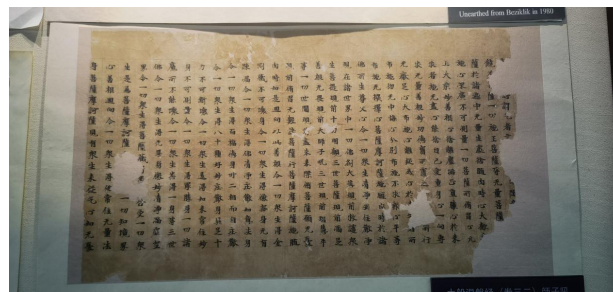
3. 宗教需求与规范的双重约束：

佛教教义层面的“虔诚性要求”：佛教视“缮写经文”为“十大功德”之一，《大智度论》记载：“书写经者，得身口意净，功德无量”，要求书写者必须以“虔诚之心”对待，形成笔法规整、结体端庄，杜绝“轻慢潦草”的风格基调。

（二）规范化管理：宗教的规范与标准

高昌寺院对写经实行严格的规范管理，包括明确字体大小、界格尺寸、书写材料等具体要求，如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大般涅槃经》（卷二三）狮子吼》残卷中，体现了“每字必入格，每行必对齐”的书写标准。这种标准化要求进一步强化了书法风格的统一性。

传播层面的“实用性导向”：佛教在西域的传播需面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水平的受众，因此写经书法必须“易识易读”，放弃文人书法的个性化表达与艺术化变形，选择楷书为主体并简化笔画，形成“实用优先”的风格特征。



（三）物质条件：书写工具与载体的技术限制

西域的书写工具与载体特性，直接影响了写经书法的形态细节：

纸张特性的制约：柏孜克里克写经主要采用本地生产的桑皮纸，其纤维较粗、表面平整度低，不适合精细的圆转笔法与浓墨厚书，圆转笔法易导致墨色晕染，浓墨厚书易造成纸张破损。因

此书作者自然选择“方折笔画”与“轻墨薄施”，形成了“笔画清晰、墨色均匀”的特征。同时，桑皮纸宽度多为 20–25cm，横向空间有限，促使字体向“扁方形”发展以适应排布需求。

毛笔特征的影响：西域毛笔多为“短锋硬毫”，与中原“长锋软毫”差异显著。短锋硬毫发力集中，更易写出“方折笔画”，且提按幅度有限，导致写经书法的提按变化小于唐代楷书，形成“刚健有力”的笔画质感。

墨料品质的限制：西域松烟墨的墨色浓度与光泽度不足，因此书作者多采用“多次轻蘸”的方式保证墨色均匀，避免“枯笔”，这也使得墨法呈现出“浓淡均匀、润燥适度”的特征。

四、柏孜克里克写经书法的历史定位与文化价值

通过与同期敦煌写经、中原楷书的对比，可清晰界定柏孜克里克写经书法的历史定位与文化价值，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书法史、文化交流、宗教艺术三个维度。

（一）书法史定位：西域楷书的“规范化样本”

在西域书法史上，柏孜克里克写经书法是“楷书规范化”的典型代表，其与敦煌写经、龟兹写经的差异显著：

对比维度	柏孜克里克写经书法	敦煌写经书法（同期）	龟兹写经书法（同期）
笔画特征	方折为主，刚柔并济	圆转居多，温润流畅	方折锐利，粗重豪放
结体形态	扁方形，中宫紧凑	近方形，结构舒展	纵势略长，疏密不均
章法风格	界格严格，行气暗藏	界格灵活，行气连贯	界格松散，排布随意
核心特质	规范中见灵动	温润中显自然	豪放中含粗犷

这种差异源于地域文化与宗教发展的不同：敦煌作为中原与西域的“过渡地带”，书法更贴近中原风格；龟兹佛教“本土化程度高”，书法呈现强烈的地域野性；而高昌作为“中原文化西传的核心节点”，既坚守中原楷书的规范传统，又融入西域审美，形成了“规范与地域的平衡”，成为西域楷书规范化的标志性样本。

（二）文化交流价值

丝路文化融合的“具象化见证”

柏孜克里克写经书法是丝路文化“双向融合”的鲜活物证，其融合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文字体系的融合：汉文与回鹘文写经在笔画特征上呈现“风格共鸣”（均以方折为主），反映了不同文字体系在西域书写审美影响下的趋同；部分双语写经中，回鹘文的书写章法（界格、间距）直接借鉴汉文规范，体现了文字体系的相互借鉴。

艺术风格的融合：中原楷书的“规范基因”与西域的“刚健审美”在笔画、结体中深度融合，如方折起笔源于北魏楷书，扁方形结体源于西域审美，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形成了“新的风格特质”。

文化观念的融合：中原“书法求规”的艺术观念与西域“实用优先”的文化观念，在写经书法中达成平衡——既追求楷书的规范庄严，又满足宗教传播的实用需求，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的相互包容。

（三）宗教艺术价值：佛教传播的“视觉化载体”

作为佛教传播的物质载体，柏孜克里克写经书法具有独特的宗教艺术价值：教义的“视觉化转译”：书法的“规范庄严”对应佛教“因果有序”的教义，“均衡对称”呼应佛教“平等慈悲”的理念，这种视觉形态与教义内涵的统一，增强了宗教传播的感染力。信仰的“物质化表达”：书写者的虔诚之心通过“工整的笔法、匀整的章法”具象化，使写经不仅是文字载体，更是信仰的物质象征：笔端端正、字字入格，直观体现了书写者的宗教虔诚。传播的“实用化工具”：简率易识的书法风格，降低了佛教经典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水平受众中的传播门槛，成为佛教在西域广泛传播的重要支撑。

五、总结

本文通过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写经书法的系统研究与分析，得出三点核心结论：其一，写经书法呈现清晰的时代演变轨迹——初创期方折刚硬、鼎盛期刚柔并济、转型期简率实用，核心形态特征可概括为“方折为基、结体扁方、章法规整、墨色均匀”；其二，其风格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原书法传统与西域审美的文化交融是核心动因，佛教教义与寺院规范的宗教需求是刚性约束，书写工具与载体的物质条件是技术基础；其三，在历史定位上，它是西域楷书规范化的典型样本，在文化价值上，它是丝路文化融合的具象化见证，也是佛教传播的视觉化载体。

参考文献

[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考古报告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2] 丛文俊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 [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3] 荣新江 高昌写本研究 [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4] 陈振濂 书法形态学 [M]. 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0.
[5] 樊锦诗 敦煌写经书法研究 [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
[6]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写经遗存整理与研究 [J]. 西域研究，2012 (3): 45–52.
[7] 李静杰 高昌佛教艺术与中原文化的互动 [J]. 敦煌研究，2016 (2): 31–38.
[8] 王妙发 西域写经书法的地域特征与文化成因 [J]. 书法研究，2019 (4): 78–85.
[9] 张小刚 柏孜克里克回鹘文写经的书法特征解析 [J]. 民族艺术，2021 (1): 120–127.
[10] 段文杰 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书法卷 [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